

《巴西史资料丛刊》第15期

巴西的发展和危机

[巴西]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著

罗 捷译 王复山 奚志华校

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巴西史研究室编印

一九八三年六月

编印者说明

《巴西的发展和危机》一书是巴西大学里不少专业的教科书，一九六八年出版后，几度再版。这里翻译的是一九八〇年第九次印刷的最新版本。

本书介绍了自三十年代到现在巴西所发生的经济变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作者对巴西的工业化、替代进口过程、通货膨胀、失业、对外国的依赖、先进技术的引进等以及巴西社会各阶级的发展、变化和各派政治力量及思想派别的斗争的论述，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巴西发展的历史、现状提供了一些素材，对我们研究当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作者是巴西有名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及其局限性，他对巴西发展和危机的根源以及今后巴西的发展道路的分析和结论，显然有的不够准确，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

引用本书时请核对原文。

武汉师院历史系巴西史研究室

目 录

| | | |
|---------------------------|---------------|------|
| 序 言 | 巴尔博扎·利马·索布里尼奥 | (1) |
| 作者前言 | | (4) |
| 第六版前言 | | (7) |
| 第一章：发展的概念 | | (9) |
| 本书的内容 | | (13) |
| 巴西的民族革命 | | (15) |
| 第二章：经济的发展 | | (21) |
| 巴西工业革命的开始：1930—1939 | | (23) |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1945 | | (27) |
| 战后的十年：1946—1955 | | (29) |
| 工业发展的巩固：1956—1961 | | (34) |
| 巴西经济发展的模式 | | (43) |
| 发展的模式 | | (56) |
| 第三章：社会的发展 | | (61) |
| 传统的社会结构 | | (63) |
| 新的阶级：企业主和工人 | | (67) |
| 中层阶级的变化 | | (69) |

| | |
|--------------------|-------|
| 第三次工业革命 | (76) |
| 巴西社会进程中阶段的超越 | (77) |
| 管理人员和中层阶级 | (78) |
| 技术界 | (82) |
| 结论 | (83) |
| 第四章：政治的发展 | (85) |
| 思想斗争 | (86) |
| 社会经济集团与思想斗争 | (91) |
| 左派的作用 | (93) |
| 引起结构变革的新情况 | (97) |
| 左派和工业企业主联盟的破裂 | (102) |
| 改良主义反对保守主义 | (104) |
| 恐慌主义和激进主义 | (106) |
| 结论 | (110) |
| 第五章：巴西的危机 | (111) |
| 决定性危机 | (112) |
| 经济危机的中期原因 | (119) |
| 从需求通货膨胀到价值通货膨胀 | (134) |
| 政治危机的中期原因 | (142) |
| 经济危机的短期原因 | (145) |
| 政治危机的短期原因 | (151) |
| 卡斯特洛·布兰科政府的社会和思想格局 | (152) |
| 工业企业主和巴西危机 | (156) |
| 科斯塔·席尔瓦政府 | (158) |
| 政治危机 | (167) |

| | | |
|---------------|---------------------|-------|
| 第六章： | 巴西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 (171) |
| | 是否是自我推动的发展 | (173) |
| | 类似于虚假的工业革命 | (175) |
| | 替代进口造成的畸形 | (177) |
| | 基本考验：工业品的出口 | (179) |
| | 巴西不发达的结构循环论法 | (183) |
| | 积极因素 | (188) |
| | 三种可行的资本主义思想 | (190) |
| | 发展的民族主义 | (191) |
| | 对领袖的评价 | (199) |
| | 工业化的技术界和四种选择 | (201) |
| | 收入的分配和经济的恢复 | (205) |
| | 动力工业的发展 | (214) |
| | 巴西发展的新模式 | (216) |
| 注 释 | | (226) |
| 作者简介 | | (232) |
| 编印者说明 | | (234) |

序 言

巴尔博扎·利马·索布里尼奥

通过在巴西和国外的专业杂志上刊登的重要文章，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教授越来越为大家所熟知。经常性的教师工作使他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把这些问题阐述准确、观点一致，必须作一个计划，明确方向，调查研究，广泛收集和深入研究参考资料。《巴西的发展和危机》一书是在教授强烈地感到。要扩大自己的学说领域并迫切希望向更多的人介绍他的学习和研究成果的心情下写成的。

本书最关注的问题是简明扼要地阐述巴西的发展。“发展”是指整体而不是指个别现象。作者对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能使那些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社会的和政治的相互矛盾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满意，因为，在密切的内在的诸关系中，不能把在一个部门取得的成果作为总发展中其它领域发展的原因、影响或条件。路易斯·卡洛斯·佩雷拉教授从来没有对说明这种观点的大量现象视而不见，正由于他以清楚的、鲜明的、准确的、肯定的观点对问题进行了阐述，所以本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是对我们大家都了解的经济发展现象解释得最好的著作之一，同时它也是一本有水平的教科书，这是作者在他勤奋的听众们严格、敏锐而又好学精神的鼓舞下，在讲课期间，日以继夜地不断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提炼成的一部综合性著作。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不打算成为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他想把社会学科同经济

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为了便于理解和说明一些现象，他打破了各个独立学科之间的界限。

我对书中的所有论点不能说都同意，我也不懂得作序者是否要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我作序的目的只是为了说明，我对他非常了解，知道他对学习严肃认真，对学术高度重视。在本书中虽然阐述多于结论，但我们对其作出的肯定性结论并不担心，而担心的是在一个领域里不能占有充分的材料，调查研究不全面和不扎实，或者，甚至于是武断的。巴西的经济社会史留给我们很多需要研究的课题，它几乎总是局限于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和作一些综合性介绍，因此，也总是明显地暴露出研究肤浅和缺乏确凿证据的问题。大家对我们农村的族长形式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都非常了解。但是，关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却缺乏严肃认真的调查研究。尽管解释很多，然而却是大胆的想象超过现实。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应该感谢L·C·布雷塞尔·佩雷拉教授，在圣保罗地区对民族企业主的人种起源进行了详尽地调查。

应该对作者的综合能力给予高度的评价，他用搜集到的材料对结尾作了别具特色的综合。这种综合，是对已经确定了的真理标准所做出的进一步证实。因为必须对巴西的现实作全面的分析，所以不能把纠缠着它的，或者说使巴西受到损害的矛盾掩盖起来，结束这些矛盾，也就是解决了矛盾。如果世界紧张形势的变化及其复杂性超出我们的权力界限，或者变得越来越困难和尖锐时，不作预见又怎么能对付它呢？

例如，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冲突。异议就是从这个术语本身开始的。L·C·布雷塞尔·佩雷拉在本书的某

些章节中，着重对埃利奥·雅瓜里贝的这个定义进行了论述。他用民族主义来反对世界主义。他讨厌“有明显的价值含义”的“献身主义”一词。但是“普遍主义”也同样包含着这种含义，它竭力掩饰谎言，并赋予它一种几乎是美化的和赞扬的世界意义。当涉及的不是一个具体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世界利益之间的关系，而是两个国家，或者说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时，一个是附属的，另一个则是统治的。为了给这种斗争下个定义，如果要用斗争来表达两种经济制度的冲突和对抗，那么“殖民主义”这个词比“世界主义”更加确切得多（正象作者自己在书的结尾部分所作出的）。“献身主义”在整体利益上就是指无偿的、有意识的割让行为。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合理的，但是在另外许多情况下却是不能用别的词汇来代替。“殖民主义”应解释为经济控制，作为一个公式，不仅自愿地把繁荣，而且把屈从和依赖也都接受下来了。

这就是现实。他们完全可以把侵略意图掩饰起来，但我们决不应该把他们遗忘忽视和吻。拉帕利泽自己说过，价值的含义只有当它符合现实时才能有意义和威力。当它脱离现实时，其本身就失去了活力，既不能自卫，又无力进攻。相反，当价值的意义和现实情况相吻合时，它就成为可信服的和无法抗拒的了。就是因为这一点L·C·布雷塞尔·佩雷拉教授才决定把对抗性的含意赋予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词。这一开端对他来说是非常意味深长的，后来他改换了词汇，用“殖民主义”一词来代替“世界主义”，真正忠实于客观现实。这一切就是他的聪慧而又出众地阐述价值的目的及其功劳之所在。

1968年于里约热内卢

作者前言

写这本书的决心来自于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不是我做的，其作者是所有那些一直参加并经历了巴西政治动乱、经济和社会变革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目睹者和当事人。这个时期开始于一九三〇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一个有深刻的教训和充满矛盾及前途未卜的时期。调查是如此的简单，因而也很难下结论。但人们最终的愿望是想得知，巴西到底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哪些是现代巴西历史过程中确定了的基本轮廓。

无疑，所提出的问题是有些苛求。我们不想在这本书中全面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仅仅想提供更多的材料来进行讨论。为此，自然我们也就给自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在此我们列举其中一部分，如，1930年至1961年期间在巴西出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对于替代进口还有某些其它选择吗？在这一发展中企业主和政府起了什么作用？最终确定如何发展？在巴西确实出现过发展吗？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变革？出现了那些新的阶级和阶层？以及出现了哪些新的思想并有什么价值？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工业主义和农业主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固定主义和发展主义之间的冲突代表着什么？这些思想是否意味着上升中的工业企业主和农业—贸易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冲突？在这过程中工人和左派团体站在哪一方？是否想组成左派和进步的工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种尝试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至于五十年代期间，权力格局是如何变动的？巴西工党和社

会民主党的联合的意义是什么？是哪些新情况打破了这种格局？如何解释激进化和恐慌主义的过程先于1964年的革命？自1961年起在巴西历史上因为开始了巴西危机而出现了真正的时局变化吗？这次危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造成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出现了替代进口过程的畸形、失业、收入的集中、实际工资的下降、缺乏市场、闲置能力，为引进技术而进行投资、缺少投资机会和在实行这种投资时，没有能力吸收巴西所拥有的劳动力等等这些都出现在这一危机中吗？通货膨胀是否也进入了这个格局？这就是危机的原因及其后果吗？是需求性通货膨胀还是价值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是由货币还是由结构造成的？一个巴西不发达的结构性恶性循环真的存在吗？或者，随着巴西已经拥有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说巴西工业革命阶段已告结束并且已经进入一个自我推动的发展阶段，而且真的存在这种自我推动的发展吗？巴西工业发展和当今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是真的相似吗？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还没有结束巴西的革命，那么巴西经济还没有经历过的伟大进程将是什么？当今巴西可能存在的思想是什么？1964年革命的思想是什么？巴西发展的潜在能力是什么？一个由专家治国论者和军人组成的政府来推动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有多大？帝国主义在这个格局中起了什么作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有什么选择？例如，发展的民族主义将是一种选择吗？它有可能实现吗？换句话说，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发展对巴西是行得通的？假设这种可能性很小，那么可否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设想一下，用社会主义方式来解决巴西问题，如果这样做的话，巴西在这方面遇到的障碍将会更大吗？

这些就是我们力求提出的一部分问题，并在本书中给以

解答。我们尽量回避一些细节和例外情况，因为我们不是在写历史。然而我们着重于做一般的解释性分析，在分析中，虽然由于简单化的做法可能会把一些特殊情况弄错，但是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水平，以便能够在总的方面对现实本身作有意义的解释。尽管有些时候，强调了经济方面的分析，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专门搞经济问题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是重要的，由于我们总是力图做全面的分析，所以我们也强调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重要性。

从目录上可以看出，本书分为六章。第一章将解释什么叫发展，并对巴西的发展作总的介绍。第二、三、四章，我们将研究从1930年到1961年巴西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第五章分析巴西的危机，这场危机始于1961年，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和社会方面都表现出了巴西的特点。最后，第六章，我们就巴西社会的前景提出了问题，针对巴西不发达的结构恶性循环和缺少能够把巴西重新引向发展道路的领导，特别专门地研究了巴西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问题。

L·C·布雷塞尔·佩雷拉

1967. 10.

第六版前言

本书想分析自1930年以来在巴西发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在这个时期，旧的国际劳动分工制度、初级产品出口的不发达的模式和寡头政治都同时进入危机。由于资本主义依赖性的农业贸易制度的垮台。巴西开始了一个工业化的进程。在经济上，我们采取了替代进口的模式，在政治上采用民粹主义，用工业化的和民族主义的思想。为工业化服务，这种思想有利于由国家进行某种干涉的同时，在本书的前四章，分析了适应社会变革的模式和民粹主义政治模式。在六十年代初，随着替代进口模式的衰竭，民粹主义政治制度也衰弱了。于是，发生了长时间的危机，这在第五章做了分析。这场危机的政治基础，在我们研究五十年代后半期使民粹主义的社会联盟削弱的新情况时，在前一章就已经介绍过了。

在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最后一章写于1967年。当时我们还没有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我就试图从研究巴西不发达的结构性恶性循环分析开始，提出国家的前景问题。在进行这种分析时，采纳了一种不景气主义的理论，当时这种理论普遍地为拉丁美洲结构经济学家采纳。

然而，自1968年起，巴西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社会的悬殊加深了，一个非常专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巩固。1970年初，本书再版时，我对这个变化做了说明，但是还没有能够对一些现象作更加全面的解释。

同年11月，在公布1970年人口调查资料之前，我在《视

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收入集中和恢复巴西经济的文章。当时竭力指出，重新获得国家高税额的增长和正在进行的收入集中这一过程有关。这可以通过对最低工资的变化和对东北部各州首府进行的调查作出结论。这篇文章是对“巴西发展新模式”作的更进一步的论述。此文写于1971年，收入了本书1972年的第三版中。由于这种变化，六十年代的危机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停滞的过程，而是被作为一个纯粹的过渡现象被肯定下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发达的模式，在未来的工作中称它为“工业化的不发达模式”被肯定下来了。这种资本主义——技术官僚的发展模式，是以收入集中和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基础的，并且还依靠一种新的政治联合，州的技术官僚，地方资本阶级和多国公司都参加了这种新的政治联合。

在本书的第三版中，我把对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研究补充了进去。但是我不愿放弃我以前做的分析，这是冒着招致某些矛盾的危险，而这些矛盾，一方面反映出我本人对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见解，另一方面反映出我们最近的历史进程也经历了这些矛盾。

以后的几版中，我们未做什么修改，只在第五版的目录中作了个序。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已经结束。自1974年起国内表现出来的经济倒退和政治危机，以及政府政策的更改，并不会改变已经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基础。

L·C·布雷塞尔·佩雷拉

1976. 2 于圣保罗。

第一章

发展的概念

发展是指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过程，通过这种变革，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变成自动和自主的。这里发展的概念是指整个社会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不断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只谈论经济发展，或者只谈论政治的发展或社会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存在这种自然的、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除非是为了教学上讲课的需要。如果经济自身的发展不能带来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如果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不是经济变革的结果和原因，那就称不上是发展，因为这些部门的变革是如此的表面和肤浅，以至于根本没有留下痕迹。一个社会制度是由经济的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组成的。正象这“制度”本身所表现的那样，这些关系都是互相依赖着的，因此，当某些关系发生变化时，另一些也必将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现在，我谈论发展总是把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作为目标，就其地理位置而言，也必然落实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大陆。然而，既然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内部各种关系就必然互相依赖着。当经济结构真正发生变革时，必然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上反映出来，反之也一样。如果反映甚微，例如收入的增长没能引起政治和社会的变革，那么这将标志着这种收入的增长对发展毫无意义，因此也不能被认为

是真正的增长。

因此，发展是一个全面变革的过程。它最重要的结果，或者至少是最直接的后果，乃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正因为如此，一般地都是用“经济发展”一词作为“发展”的同义词。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占主导地位。但是，在特定的时刻，政治也可能成为发展过程的动力，象奇特地发生在共产党国家的那样。然而，这些现象总是带有例外的色彩。一般的发展规律，总是把经济变革作为自己过程的主要方面，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发展过程的最佳结果。

现在我们专门谈一下生活标准，而不是谈论按人口平均的收入。生活标准的改善，福利的增加，都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化社会的目标。因此，把发展和提高生活标准等同起来看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另一方面，尽管按人口平均收入是用于衡量生活标准的尺度，但是，这种衡量是有缺陷的。因为往往按人口平均收入增加了，而生活标准没有提高，那些极特殊情况例外。而出现这种情况时，也可能没有发生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因此收入的增加也只是偶然的和不稳定的，所以，我们还不能把它说成是经济发展。

发展过程真正出现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必将渐渐趋于自动、自主和必然。当经济发展过程开始在其内部发生时，这种改善就会是自动的。例如，当一个国家进入贸易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受到利润的刺激，再投资变成有规律时，发展就自动化了。当我们进入一个更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即具备了工业化的特点，随着再投资和企业的增长成为企业本身的生存条件时，发展不仅仅趋于自动，而且成为必然。收入自动增长的倾向，总的来说具有经济发展的特点，事实上是这种经济发展一旦开始，发展不仅仅在其内部必然发

生，而且还在它自己的范围内，特别是在国内市场上，寻找
到其本身的动力因素。

根据对这种制约方式的理解，这种变革不仅仅是经济、
政治、社会应该同时发生变化，而且，其更直接的结果是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提高是自动的、自主的和必然的，
或者说是自力更生的。这样，这种发展就占有一定的历史地
位。当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
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发生：即在一个具体的国家或地区，生产
关系和生产技术具备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特点，或者是社会主
义占优势的特点；当国家机构，生产管理和社会本身的存在
不再被传统的标准所约束，并处于理性主义之中；最后，当
社会的基本财产不再像传统经济制度那样只是土地，或者象
贸易资本主义那样只是商品本身；而是象社会主义和工业资
本主义那样，把资本投入到不动产和生产设备上。

在这些方面，谈论古希腊或者法老的埃及的发展是毫无
意思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谈论在甘蔗和黄金时代巴西的发
展。在那个时期，毫无疑问财富是得到了增长。然而，这种
增长就其规律而言，只是有益于一小部分人。并且对社会和
政治的变革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没有改变社会结构或更
改那个地区的权力制度，而且，这种财富的增长，缺乏任何
自动、自主和必然的特性。因此，根据我们正在使用的这个
词的现代意义来说，并未出现发展。

一个国家的发展，一般都有一个相当具体的标准。只有
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即一个国家处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占优势的历史过程中，才出现发展。在一个基本上还是传统
式的社会里，可以出现一个经济上升的阶段，这种上升只是
为以后的发展提供条件。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一九三〇年在巴

西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然而，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开始出现发展：即只有在传统国家进入危机阶段，理论标准开始战胜传统观念；资本变得比土地更重要；才能开始超过血统；法律限制了习惯势力；客观的和官僚关系开始代替个人的和世袭为特点的关系；主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的二元社会开始被多元社会所代替；政权显然不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寡头的特权，而开始变得越来越分散；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开始由工业的和现代化的经济代替；基本的生产单位不再是家庭，而是企业，尔后，也不再是家庭企业，而是官僚企业；传统的生产方式让位给合理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效率成为生产单位的基本目标，发展经济变成社会之目的；再投资成了企业生存的条件；总之，当生活水平开始以自动的、自主和必然的方式提高时，才开始出现发展。

为了在一个国家里出现全面变革的过程和开始出现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进行一场政治革命，尽管不少次是这样实现的。然而，主要的传统统治阶级——一般指具有贵族特征的政治寡头集团——在政治上对国家的控制，应由中层阶级集团所代替。这种代替越快、越完善、政治革命就越彻底。不管是英国克伦威尔的革命，还是一九三〇年的巴西革命，在社会和思想上远不如法国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那么彻底。因此，在那些国家里，中层阶级集团获得权力和贵族集团丧失权力，都是缓慢地进行的。而在法国，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事件中，只一次政变就实现了这一目标。也有例外，象在日本，为了开始发展，政治权力可以不由中层阶级集团来掌握，而由衰落的贵族党派掌握。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即政治权力主要地或独一无二地掌握在：或者是由资产阶级企业主，或者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家或军人，或者是由